

帝國讀者對被殖民者文學的閱讀與 想像：以同人雜誌《文藝首都》為例

王 惠 珍^{*}

摘要

本文主要以日文同人雜誌《文藝首都》作為考察範疇，探討帝國讀者如何閱讀想像殖民地作家的文本。首先，探討《文藝首都》主編保高德藏的個人經歷，釐清他的生命特質和經歷，說明他與這群旅日的殖民地作家之間有怎樣的互動經歷，且如何支持他們的創作活動。接著，探討殖民地作家在《文藝首都》發表的情況，及殖民地同人間的互動情形。

最後，探討《文藝首都》讀者對被殖民者文學的閱讀理解。根據新挖掘的資料，以金史良的〈光之中〉與青木洪的〈在東京的角落〉為例，說明欠缺殖民地理解的同人讀者對於殖民地作家作品的閱讀想像，有其「見」與「不見」，大都停留在文學層次的討論，文本中隱匿於人物憤怒情緒與認同矛盾中的敘事情節，常被略而不提。總之，在日本文學場域中，殖民地作家知音難尋，他們在日本文壇的存在價值隨著時代變遷，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關鍵詞：帝國讀者、被殖民者文學、《文藝首都》

2012.04.01 收稿，2012.06.17 通過刊登，2012.07.15 修訂稿收件。

* 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　　言

日本帝國為建置強而有力的殖民統治體制，在殖民地臺灣、朝鮮積極地推動國語教育，但因被殖民期間的長短、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日語的普及率高低各不同。¹但 1930 年代後，兩地紛紛培養出以日語作為創作語言的日語作家，競相前進日本文壇尋求發展，如：朝鮮的日語作家張赫宙（1905~1997）、金史良（1914~1950）、李石薰（1907~）、鄭人澤（1909~）、洪鍾羽（1908~？）等小說家，和金龍濟（1909~1994）、韓植（1907~）、金鍾漢（1914~1944）等詩人。²臺灣的日語作家則有楊達（1906~1985）、張文環（1909~1978）、呂赫若（1914~1951）、龍瑛宗（1911~1999）等小說家，和王白淵（1902~1965）等詩人。

朝鮮隨著殖民地日語教育的普及和移民日本人數（其中包括日本為戰爭之需，強行綁架的朝鮮人）的增加，1930 年代粗估約有 30 萬人。1920 年代後期在日朝鮮作家的日語作品已凌駕朝鮮語作品，1945 年之前日語文學作品的作者大多數是在日的朝鮮人。³因此，有學者認為在討論殖民地時期朝鮮日語文學時，應該可以再細分為，在鮮日語文學與在日的朝鮮人文學進行討論。⁴其中，後者是較為臺灣讀者所熟悉的。誠如張文環所言，臺灣讀者對朝鮮的認識甚為有限：「僅閱讀過內地的雜誌或單行本中所表現朝鮮的文章，和看過崔承喜女史的舞蹈」⁵，還有認識幾位朝鮮友人而已。另外，《臺灣公論》的朝鮮特輯中，白石潔所提及的朝鮮作家⁶，則以中央文壇知名的朝鮮日語作家張赫宙和金史良為代表，說明他們在日的文學成就，以肯定朝鮮國語運動的成果。

張赫宙最為臺灣所熟知，他於 1932 年以〈餓鬼道〉一作榮獲第五屆《改

¹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海行今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市：允晨文化出版，2001），頁 33-76。

² 白川豐，〈第一章 日本雑誌に發表された舊植民地作家の文學〉，《殖民地期朝鮮の作家と日本》（岡山市：大學教育出版，1995），頁 2。

³ 任展慧，〈日本における朝鮮人文學の歴史〉，《國際高麗學會日本支部通信》第 3 號（1994.12）。

⁴ 鄭百秀，〈コロニアリズムの超克——韓國近代文化における脱植民地化への道程〉（浦安市：草風館，2007），頁 224。

⁵ 張文環，〈寄給朝鮮作家〉，《臺灣公論》12 月號（1943.12），頁 82-84。

⁶ 白石潔，〈朝鮮作家と國語問題〉，《臺灣公論》12 月號（1943.12），頁 76-81。

造》懸賞創作獎，獲獎後在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悉心的栽培下，由改造社為他出版第一本創作集《叫做權的男子》（1934），成為當時臺、鮮殖民地文學青年競相仿效，前進中央文壇的成功典範。⁷ 金史良成名較晚，1939 年發表於《文藝首都》的〈光之中〉，成為芥川獎後補作品，其文學成就頗受文壇關注。相較於此，三〇年代臺灣日語作家雖曾進軍日本文壇，獲得發表機會，但大都曇花一現，並未久居日本，最後大都轉而積極參與殖民地文壇的文化活動。

在文學生產・消費的過程中，「讀者」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是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對話者。讀書市場的讀者數確認不易，除了雜誌出版社等有其讀者票數統計的「量化」問卷調查之外，受限於史料，量化研究實屬不易。雖然一般讀者的閱讀回饋與感想、私人日記等史料，尚可知其一二，但這些文獻資料甚為瑣碎掌握不易，難以進行質性分析。因此，只能從僅存的同人資料中，重新拼湊斷簡殘篇，以窺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文藝首都》係屬一般同人雜誌，思想傾向較不鮮明，以純然對文學感興趣的讀者居多。其中，刊有「文藝首都愛讀者」座談會和「各地讀者會」、「談話室」記錄等，內容主要記載當時同人互評的內容或讀後感等，確切可辨。因此，本文將利用這些資料進行「讀者閱讀」分析，希望從這些讀者的閱讀反應中，檢視日本帝國讀者對殖民地作家作品的閱讀與想像。

保高德藏（1889~1971）熱心助人，主編的同人雜誌《文藝首都》除了培育多位日本新人作家，同時也扮演著殖民地作家的「世話人」（照料人）的角色，甚至提供暫時的棲身之處，為殖民地作家尋覓在日發表的機會。張赫宙與金史良等朝鮮作家旅日期間深受照顧，楊達和龍瑛宗 1937 年訪日期間也同樣受到保高多方的協助。他之所以如此關照殖民地作家，並非因「主義信仰」，亦非「商業利益」的考量，全然是出自於保高個人的殖民地經驗與人道主義的關懷。

筆者曾檢討過《文藝首都》同人對龍瑛宗的〈宵月〉的閱讀批評，在同人的讀書會裡，除了金史良與保高德藏對〈宵月〉有較深刻的閱讀理解之外，未有殖民地經驗的同人讀者，對凸顯臺灣殖民地教育問題與知識分子苦悶的文本，其閱讀像是欠缺共鳴的，多將閱讀重點置於文學技法上。⁸ 受限於篇幅

⁷ 王惠珍，〈戰時東亞殖民地作家的變奏：朝鮮作家張赫宙與臺灣作家的交流及其比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3 期（2011.11），頁 1-50。

⁸ 王惠珍，〈龍瑛宗と《文芸首都》同人との交流〉，《天理臺灣學會會報》12（2003.06），頁 71-84。

的關係，本文將聚焦於朝鮮作家的作品探討，是否誠如張文環所言，因朝鮮在地理位置上較接近日本，因此，他們的作品受到日人較多的重視與理解呢？還是，仍舊無法擺脫帝國讀者對殖民地既有的成見呢？

本文將以日文同人雜誌《文藝首都》作為考察範疇，探討帝國讀者如何閱讀想像殖民地作家的文本。首先，探討《文藝首都》主編保高德藏的個人經歷，釐清他的生命特質和經歷，說明他與這群旅日的殖民地作家之間會有怎樣的互動經歷，又如何支持他們在帝國文壇的創作活動。接著，探討同人雜誌《文藝首都》是怎樣的一個殖民地作家與日本讀者同人互動的平臺，殖民地作家又如何利用此平臺與日本讀者建立「可能」的互動關係，產生新的閱讀共同體？最後，以實證的方式，透過史料檢證同人讀者對於殖民地作家的文本究竟有怎樣的閱讀想像？是懷著異國情調的好奇？還是抱著同情的理解？思考殖民地文本在日本的讀書市場裡，他們的「真正的讀者」身在何處？

二、《文藝首都》主編保高德藏與殖民地作家

《文藝首都》（1933年1月～1970年1月）為同人文藝刊物，自始至終皆由保高德藏（1889～1971）一人擔任主編。他雖1932年2月發行同人雜誌《文學・クオタリイ》第一輯，雜誌的第一部分以新人作家的新作為主，第二部分主要是集結知名作家個人最喜歡的舊作為主。又於同年5月發行《文學・クオタリイ》第二輯，之後改發行月刊《文藝首都》。在第二輯中特地將初登文壇的朝鮮作家張赫宙的〈迫田農場〉置於卷首，並於〈後記〉中說明其理由：

首先，卷頭的〈迫田農場〉的作者張赫宙，是《改造》本年度徵文比賽中獲獎作品〈餓鬼道〉的作者，我想這是讀者所皆知之事。作為朝鮮民族代表的作者，進入日本文壇的張氏，想在我國文壇如實傳達世界上最為苦惱的民族，朝鮮民族的聲音。他是感受到如此大的希望和使命的作家，這次多達九十張的《迫田農場》事實上亦超越前述意義，這是他在我國文壇發表的第二篇作品。⁹

可見保高對張的提攜之意。保高的妻子保高みさ子在傳記小說《花實の森一小

⁹ 轉引自丸茂正治等編，〈文藝首都略年表〉，《文藝首都》第39卷中刊紀念號（1970.02），頁105。

說「文藝首都」》¹⁰ 中，陳述保高鍥而不捨堅守《文藝首都》的精神，勾勒出圍繞在他身旁的文學家和同人群像。保高踏上文學之路的始末，與他少年時期的朝鮮經驗關係密切。¹¹ 在他孤寂的殖民地生活裡，文學是他重要的精神食糧，如此的生命經驗也影響他日後對待殖民地作家的態度。保高柳橋的私宅是雜誌的發行所，亦為當時多位文學者的駐足之處，除了當時的新進作家，如谷崎精二、淺見淵、田村泰次郎、湯淺克衛等人，或是參與編務相關人士，如風間貞一、金原健兒、中島直人等人之外，尚有「長期逗留」者，如初至東京的張赫宙和從事地下運動的左翼婦女鬪士。張赫宙於 1932 年 4 月〈餓鬼道〉一文當選《改造》懸賞創作獎後的三個半月，皆寄宿在柳橋的保高家。¹²

金史良經張赫宙的介紹，前往保高家拜訪，初次到訪的他身穿筆挺的學生製服，給人素樸溫厚青年的好印象。金出身平壤「兩班」（文武兩班的舊貴族階級）的資產階級，母親曾留學美國。他原先計畫中學畢業後，先到北京大學求學後，再前往美國留學。由於中學三年級時捲入日鮮學生衝突的光州事件，而潛逃到日本投奔在京都就學的兄長。在兄長的安排下進入佐賀高校，爾後進入東京大學就學。保高因個人的朝鮮經驗而與這位單純的熱血青年，隨即成為忘年之交。¹³ 在他的鼓勵之下，金史良積極從事文學創作，1939 年發表於《文藝首都》的〈光之中〉，獲選芥川文學獎的後補之作，其創作實力備受文壇關注。初啼試鳴後，他的作品陸續刊載於日本文壇重要的雜誌刊物如《文藝春秋》、《新潮》、《文藝》等之中。

在他獲選後，特地寫了一封信給未能出席芥川文學獎頒獎典禮的母親，信中提到陪他出席頒獎典禮的保高，為了幫他送十部刊有〈光之中〉的《文藝首都》到文藝春秋社，在送件的過程因太過急忙而被汽車車門撞傷，頭部鮮血淋漓，負傷在大阪大樓內爬了六層，令他深感歉意。在頒獎典禮中，由保高介紹這位文壇新人¹⁴，由此可見保高對金史良真是呵護備至。

據說身材魁梧的金史良曾在一場私人宴會中，自告奮勇要求表演朝鮮「劍舞」，甚至放言「半島舞姬」崔承喜的劍舞還是他教的，其舞技精湛令人在座者為之驚艷，讓人不得不信服，重新評估金史良與崔承喜、崔承一等左翼文化

¹⁰ 保高みさ子，《花實の森一小説文芸首都》（東京：立風書房，1961）。

¹¹ 同上註，頁 20-21。

¹² 同上註，頁 65。

¹³ 同上註，頁 180-181。

¹⁴ 金史良，〈母への手紙——芥川賞授與式に參列まで〉，《文藝首都》8 卷 3 號（1940.03），頁 118-121。

人的關係。¹⁵

保高みさ子對於金史良喜於在眾人之前炫耀其出身，甚為不解，但卻認為：

他是位民族意識高漲的愛國主義者，非常認真努力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幽默的道德主義者。天真地自豪著自己的家世和財產（之後，可以想像這是與他當時民族意識是相關連的），無男女、階級之別地立刻與他們同化，並融入其內部，具有一種獨特魅力的人物。¹⁶

藉由文藝同人側身描繪出，這位來自殖民地朝鮮洋溢自信和文學熱情的青年。

金史良在東大就學期間，1936年因友人安英一（禎浩）所屬的新協劇團的關係，輾轉拜訪了日本左翼戲劇人村山知義，結識日本左翼文化人士，但也因而捲入1936年的「共產學者關係者」取締事件。10月28日因朝鮮藝術座遭檢舉，安英一、金龍濟等人遭到拘留，他也身受牽連被拘禁在本富士警察署，被釋放後立即返國。¹⁷ 1941年左右金史良曾在給龍瑛宗的信裡提到：

兄臺可否認識臺灣出身的詩人吳坤煌。我曾不期在某警察局中遇過，眉目清麗令人印象深刻。前年我去北京，在返回天津時，於天津車站的月臺上曾與他偶然相遇。現在寫信才想到，據說是寫小說的，叫張文環的已沒有寫小說了嗎？總覺得曾在哪裡讀過。¹⁸

金在信中提及吳、張兩人的名字並非偶然，因為臺灣留學生在1936年取締人民戰線運動的過程中，亦同受牽連。其中，張文環因江東區左翼同人雜誌《ズボン》的關係，和劉捷一同被拘留在本富士警察署，不久吳坤煌也被逮捕。江東左翼團體、《文藝街》、《ズボン》同人雜誌等團體，與朝鮮左翼團體有合作關係。其中，村山知義往來密切的朝鮮藝術座金斗鎔，曾企圖利用江東區戲

¹⁵ 同註12，頁184。

¹⁶ 保高みさ子，《花實の森—小説文芸首都》（東京：立風書房，1961），頁186。

¹⁷ 安宇植，〈金史良年譜〉，《「在日」文學全集》（東京：勉誠出版，2006），頁434。

¹⁸ 下村作次郎，〈戰後初期の臺灣文學〉，《文學で読む臺灣：支配者・言語・作家たち》（東京：田畠書店，1994），頁210-212。頁210行16（三字或是四字不明）筆者根據原文：「同君とは計らずも或いは（三字あるいは四字不明）の中で會つたのですが」，無法判讀的字根據《龍瑛宗全集 資料輯（七）》（陳萬益等編，1998）的原件判讀，應是「警察」二字。頁211行3：（二字不明），根據原件判讀，應是「背負」二字。由於釐清「警察」二字，因此可推斷三人曾在本富士警察署邂逅。

劇運動重建共黨活動基地。在這一波肅清活動後，《ズポン》、朝鮮藝術座等同人團體隨之潰散，其中，牽連了不少旅日臺、鮮反日文化青年。¹⁹ 當時活躍於日本左翼戲劇界的吳坤煌，除了結識日本知名的戲劇家秋田雨雀、村山知義等人之外，並與朝鮮藝術座金斗鎔朝鮮左翼文化人士互有往來交流²⁰，崔承喜舞蹈團 1936 年之所以來臺公演，亦是他居中穿針引線²¹，可知旅日期間吳坤煌與朝鮮左翼文化人士關係匪淺。從上述三人的交友關係與左翼文化活動的參與情況，可知他們結識的人物和參與的團體有其重疊性，金史良極有可能與他們共同經歷了這一逮捕事件，成為一起被「順便修理的朝鮮臺灣的民族反日分子」²²，一起被拘留在本富士警察署，因此信中才會提及吳坤煌、張文環兩人。

1940 年金史良年輕的妻子返國待產之際，特地搬至保高家附近，除了三餐到保高家用餐之外，其餘的時間則埋首寫作。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竟在鎌倉的住處直接被帶到鎌倉警局拘留了幾個月。島木健作曾向特高課長詢問其拘提的理由為何？但據說是依縣警部的指示，因其學生時代曾翻譯過朝鮮人劇團演出的德國戲曲等。最後，在保高德藏、島木健作等人的奔走下才被保釋出來。²³ 隔年隨即返國，以朝鮮義勇隊從軍記者的身分潛入中國延安。戰後返回故鄉平壤，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中擔任要職，活躍於文藝界，1950 年韓戰爆發後，隨軍報導竟途中病歿，享年 36 歲。²⁴

金史良自 1939 年結識保高到 1942 年返國的三年間，是他文學創作的高峰，保高對這位朝鮮的青年作家呵護備至，稱他「非一般老鼠」（非比尋常），當他激動地對著保高拍桌怒斥：

因為日本命令要朝鮮出米，所以朝鮮出米，這次因為命令要出力所以出力，出血（對朝鮮人施行徵兵制）所以也出血了。而日本對朝鮮卻什麼

¹⁹ 柳書琴，〈1936 年旅日臺灣作家被捕事件〉，《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北市：聯經，2009），頁 352-361。

²⁰ 下村作次郎，〈臺灣人詩人吳坤煌の東京時代（1929 年-1938 年）——朝鮮人演劇活動家金斗鎔や日本人劇作家秋田雨雀との交流をめぐって〉，《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 27 號（2006.03），頁 31-49。

²¹ 下村作次郎，〈現代舞蹈和臺灣現代文學——透過吳坤煌與崔承喜的交流〉，《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臺北市：文建會，2007），頁 159-175。

²² 劉捷，〈張文環兄與我〉，《滾地郎》（張文環著，廖清秀譯，臺北：鴻儒堂，1976），頁 312。

²³ 同上註，頁 187。

²⁴ 安宇植，〈金史良年譜〉，頁 442。

也都沒做。關閉專科以上的學校，不讓學生就讀。在公司也好，役所也罷，要是有朝鮮人，是有能力者，則給予一定的限制不給晉升。如此，你想能得到朝鮮人的協力嗎？日本人不知道什麼叫做 give and take !²⁵

對此保高只能沉默以對，在金肆無忌憚的責難中，顯露出兩人深厚的信任感與友誼，但也流露出個人間的友情實難凌駕超越於種族、國家殖民體制等的無奈感。

1937 年龍瑛宗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榮獲《改造》懸賞創作獎，在他訪日之前，曾捎信給張赫宙。張赫宙透過改造社回覆給他的信件裡，提到：「請一定要見保高德藏（芝區巴町 1）和湯淺克衛（芝區愛宕町愛山莊）這兩位，因為對我們殖民地人理解很深。」²⁶因此，他在抵達東京之後，隨即前往文藝首都社拜訪保高，並受到他熱心地招待，為初訪東京的龍瑛宗介紹日本文壇近況，引領他前往銀座、新橋、新宿等文學家們經常出沒的聚會場所，結識文壇友人。根據保高寄給龍瑛宗的信件中，可知龍返國後，保高仍積極地向他邀稿，並熱情地邀請他加入他們的同人雜誌，進而促使龍撰寫〈宵月〉一作與《文藝首都》同人有其交流之機會。²⁷

1937 年楊達為了《臺灣新文學》的續存問題另謀出路，6 月至 9 月訪日三個月，在此期間特地拜會《日本學藝新聞》、《星座》、《文藝首都》的負責人，商談為《臺灣新文學》設置版頁的問題。最後，卻因七七事變爆發，楊達被捕而作罷。²⁸戰後楊達憶及此行時提到：曾在《文藝首都》的編輯室見到保高，也遇見石川達三。保高在閱讀完楊達的小說〈模範村〉原稿後，將他介紹改造社《文藝》的主編，尋求刊登的機會，但最後仍被退稿。²⁹

楊達在訪日期間積極地為《日本學藝新聞》、《星座》撰稿，介紹臺灣文學的動態等，希望與這些日本同人刊物建立互動關係。其中，他因購讀了中國東北作家蕭軍的《第三代》，而將其讀後感和批評日本作家小資產性的〈《第三代》及其他〉一文寄至《文藝首都》（5：9）刊載。由於中日戰爭爆發、經濟問題等外在因素使得《臺灣新文學》不得不停刊，讓此一帝國與殖民地同人雜誌間的合作案未能實踐，但在保高捎給龍瑛宗的書簡中，仍掛心著楊達是否

²⁵ 保高德藏，〈初版への序〉，《金史良作品集》（東京：理論社，1972）頁 1-4。

²⁶ 張赫宙致龍瑛宗書簡，1937 年 6 月 14 日。

²⁷ 王惠珍，〈龍瑛宗と《文芸首都》同人との交流〉，同註 5。

²⁸ 河原功，〈楊達的生涯〉，《講座 臺灣文學》（東京：國書刊行會，2003），頁 95。

²⁹ 戴國輝、內村剛介訪問；葉石濤譯，〈一個臺灣作家的七十七年〉，《楊達全集資料卷》（彭小妍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頁 256。

平安返臺。³⁰

保高德藏犧牲自己的創作時間處理同人雜誌《文藝首都》的種種雜務，執著於經營一個培育新人作家的文學園地，其慷慨助人的人格特質及其特殊的殖民地經歷，使他「義不容辭」地照顧殖民地作家，並提供他們在同人誌上發表作品的機會。他對殖民地作家的理解與提攜，純粹是出自於個人對弱者的人道關懷，及企圖超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支配關係，希望建立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理想關係，透過文學的形式讓更多日本內地讀者理解殖民地的現況和受殖者的心理狀況。

三、同人雜誌《文藝首都》與殖民地作家

保高德藏 1915 年畢業於早稻田英文科，同屆知名的文學者有青野季吉、直木三十五、西條八十、坪田讓治等人，另外早其一、二年的學長則有廣津和郎、宇野浩二、谷崎精二等人，皆是活躍於當時日本文壇的一線作家，他們為了支持保高德藏的文學理念，友情贊助出席《文藝首都》關西巡迴作家對談活動，此舉傳為當時的文壇佳話。³¹

1933 年 1 月起保高德藏所發行的月刊誌《文學クオタリイ》改為《文藝首都》，並於 3 月創設「新人文藝欄」，由廣津和郎挑選短篇作品，窪田空穗挑選短歌，新井聲風挑選俳句，林芙美子挑選詩，但 1936 年因經營問題使得 9、10 月號停刊，11 月號才又復刊。之後成立「文藝首都之友會」廣募雜誌同人繼續營運。戰爭末期因物資缺乏雜誌發行極為困難，又再度停刊。戰後 1945 年 11 月再度復刊，直至 1969 年 12 月才正式謝幕停刊。

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戰長期維繫這份同人雜誌如期發刊並非易事，完全憑藉著主編保高德藏一人對文學的熱情與無私的奉獻精神，在資金短缺、戰時紙張配給吃緊等隨時可能停刊的危機下，克服萬難持續發行，是一份相當難得的同人雜誌，這份雜誌的發刊史，足以視為處於主流出版媒體之外，非主流作家們的奮鬥史。由該雜誌所培育出的知名作家，例如：芥川獎得主半田義之（〈雞騷動〉，1939 年 6 月）和芝木好子（〈青果の市〉，1941 年 10 月）、金史良（〈光の中に〉，1939 年 10 月）等人。戰後也繼續培養出北杜夫（1927~）、

³⁰ 保高德藏致龍瑛宗書簡，1937 年 7 月 27 日。

³¹ 衆坪良樹，〈文藝首都〉，《日本近代文學大事典第 5 卷》（東京：講談社，1978），頁 380-381。

佐藤愛子（1923~）等文壇知名作家，其中較為臺灣讀者熟悉的《太過野蠻》（吳佩珍譯，臺北：印刻文學，2011）的作者津島佑子（1947~）也曾是《文藝首都》的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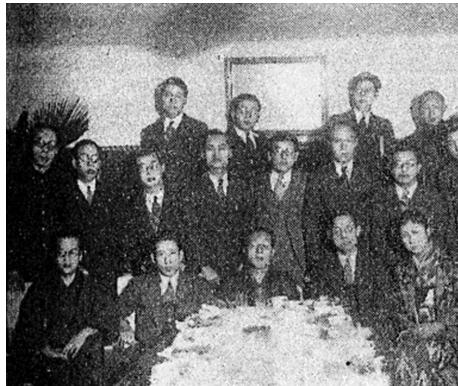
《文藝首都》闢設的欄位有「創作」與「時評」等，讀者創作欄又依文體分成小品、散文、隨筆、俳句、短歌選。其中，俳句與短歌選中偶見有來自朝鮮、臺灣、滿洲的日籍歌人，如朝鮮的桑野青路、臺灣的廣江英治、吾妻英三郎等人。整體而言，殖民地出身的作家刊出率並不高，主要仍與編輯保高的積極邀稿有關。1933年至1938年期間張赫宙的作品居多，1939年後金史良與龍瑛宗的作品居多。³² 1935年上京的張赫宙在保高熱情的邀約下，兩人相偕前往關西，現身於文首大阪支會與神戶支會會場：



保高德藏氏 張赫宙氏

【圖一】

〈春日散步〉三年不見遠自朝鮮上京的張赫宙氏。春天風和日麗，拜訪保高氏，外出散步。從柳橋到濱町河岸，隅田川的水面春光閃爍。小蒸氣船拽著幾艘貨船潮流而上，一線蒸氣悠然而下。張氏唸著：「東京已是春天，朝鮮仍舊寒冷。」兩人在進入濱町公園時，剛好在一處合照。



【圖二】

文藝首都讀者支部之會在各地發展。這是偶爾找來保高德藏、張赫宙兩氏出席，那晚氣勢盛大的光景，（從前列左）天野、張、保高、柴田諸氏。

他在文首大阪支局三月例會中，再度重申他之所以離鄉到日本文壇尋求發展的理由：

我過去曾在《文藝首都》與《改造》上發表過小說，雖然日本的各位已讀過，但在朝鮮卻遭禁好幾回，……，我對表現手法和作品的構想並不介意，而是想將朝鮮這個國家的人們和風俗等「作為記錄」，介紹給日本人，甚至再大的世界，今後我將仍會書寫以朝鮮為背景的小說。³³

³² 請參閱本文附錄（一）「殖民地作家刊載於《文藝首都》之作品目錄初編」。

³³ 藤井壺，〈支部通信：文首大阪支局三月例會會報——保高、張氏歡迎〉，《文藝首都》3卷5號（1935.05），頁207。

可見，張赫宙的文學志向在於記錄朝鮮，企圖以日語向日人讀者介紹朝鮮的風土民情。

作家創作時有其預想的讀者群，臺灣主要的日語作家大都以日語創作，部分作家雖有漢文基礎，但因 1937 年 4 月漢文欄遭廢止，漢文的發表空間緊縮，日語成為他們主要的創作語言。但大多數的朝鮮日語作家卻皆有雙語寫作能力，會隨其預定讀者群的差異，而選用日語或是朝鮮語作為創作語言。若將讀者設定為日語者，便會積極參與日本文壇的徵文比賽，或與建立日本普羅文學的合作關係，以追求日語文壇的成就為目標。若將讀者設定為朝鮮語者，大都以只懂朝鮮語的大眾為對象，進行文化啟蒙之理想，以維繫民族文化為己任。前者以張赫宙為代表，他雖曾以朝鮮語寫作，但作品並未受到肯定，因而改以日語創作。1932 年獲獎後進入日本文壇，適逢與殖民地關係密切的日本普羅文學運動由盛轉衰，但他仍與他們維繫某種程度的同伴關係，有多篇作品刊載於《文學案內》等左翼同人雜誌上。獲獎後，他雖然頂著《改造》懸賞創作獎的光環，但未很順利地進入日本的讀書市場，1933 年度的作品幾乎皆刊載於《文藝首都》。

楊達雖曾以臺灣話文寫作，但最後仍選擇日語作為創作語言。1934 年以〈送報仇〉入選《文學評論》的徵文活動第二名（第一名從缺）進入文壇，活躍於日本的普羅文藝刊物中，儼然成為臺灣文學的代言人，積極地於《文學評論》³⁴ 和《文學案內》³⁵ 等舊普羅文學系的雜誌發表作品。和張赫宙一樣，舊普羅文學系統的雜誌提供他們發表空間，他們也為舊普羅文學系的雜誌提供另一種殖民地的文學風景，以建構「進步性」的連帶關係。但，保高的同人雜誌

³⁴ 《文學評論》（1934.07~1936.08）月創刊，由ナカウ社發行，在日本普羅文學運動瓦解後，為主要刊載舊普羅文學作家們作品的雜誌，亦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論爭的主要舞臺。1936 年因社員違反軍機保護法而遭檢舉，因而於 8 月號（果戈里追悼號）發行後停刊。在該雜誌發刊期間，對於殖民地作家寄予高度的關心，提供紙面刊載中國、朝鮮、臺灣等地與左翼文學相關的之作品。又，與楊達《臺灣新文學》的合作關係備受矚目。（白川豐，〈日本に誌雜發表された舊殖民地作家の文學〉，（岡山市：大學教育出版，1995），頁 9-11）。

³⁵ 《文學案內》（1935.7~1937.4）為普羅文學系的大眾小說家貴司山治在普羅文學運動遭鎮壓後，所發行的雜誌，該雜誌主要以啟蒙勞動者、農民為對象，以刊載「進步性」的作品為主。貴司特地連絡朝鮮、中國、臺灣的作家等，致力於維繫普羅文學的續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輯即是「朝、臺、中國新銳作家集」，除了張赫宙的〈アン・ヘエラ〉之外，皆是描寫各地的農村現狀。另外，該雜誌亦不時朝鮮、臺灣等文壇的現狀報導。楊達的多篇作品，即是應此編輯方針之需所撰之稿。（同上註）。

《文藝首都》並不隸屬於普羅文學運動下的刊物，純然只是文藝同人性質的雜誌。雜誌風格顯然與綜合商業雜誌一味追求「異國情調」的新鮮感，或左翼雜誌要求「普羅階級」的連帶關係不同。在此一創作平臺裡保高純然地試圖提供殖民地作家「對等」的寫作空間，希望日本的雜誌同人亦能「對等」看待他們，藉由與內地同人讀者互動，激發殖民地作家新的創作動能，建置雙方良性的互動關係。

左翼人士德永直雖曾質疑過張赫宙的「進步性」³⁶，但對張而言「朝鮮」民族才是他關心的重點，藉由日語作品的發表，尋求在日本文壇發言的位置。他雖然成功地逃離了殖民地的檢閱制度，但殖民地作家的身份仍羈絆著他。在日本法西斯猖獗的時代，日本作家的寫作自由，因國家檢閱的暴力而被飽受干擾，殖民地作家的作品在刊行之際，更是除了「階級立場」問題之外，還得接受「民族立場」的檢視而無所遁逃。當權者強勢地逼迫作家服膺殖民主的統治意志，張赫宙雖僅屬於普羅文學運動的同伴作家而已，但竟屢遭禁刊：

前號拙作〈奮起者〉遭禁。刊載於本誌創刊號的〈我的文學〉險些遭禁。去年十月發表於《改造》的〈被追逐的人們〉在朝鮮遭禁。文壇出道才兩年，已兩度遭禁。拙作當成作品甚為拙劣，常有自覺。在此明言，那些作品如果以日本名發表的話，將不至於遭禁。對於為了我而受到意想不到損害的保高兄，深感抱歉。

我想今後我的創作方針，非得改變不可。³⁷

保高因他的〈我的文學〉一文被傳喚至警視廳接受偵問³⁸，讓張赫宙深感愧疚，並重新思考創作方針。因為在日朝鮮作家的「民族」身分，總是刺激著檢閱官敏感的神經，為了不讓雜誌社蒙受牽連，他們對於個人的言論不得不更為謹慎。〈我的文學〉中他說明了之所以留在日本尋求發展的原因：「我想要讓廣大的世界知道這些民眾悲慘的生活，想要控訴。希望我的文學因此而存在，而有其價值。³⁹」如此的創作願景自 1932 年 1937 年之間，逐一地被實現，《被追逐的人們》在波蘭以世界語被翻譯出版，在捷克也以世界語譯出短篇集

³⁶ 德永直，〈プロレタリア文壇の人々〉，《行動》2 卷 12 號（1934.12），頁 188-191。

³⁷ 張赫宙，〈翻譯の問題・その他〉，《文藝首都》1 卷 10 號（1933.10），頁 45。

³⁸ 張赫宙，〈私に待望する人々へ——德永直氏に送る手紙〉，《行動》3 卷 2 號（1935.02），頁 190。

³⁹ 張赫宙，〈我的文學〉，《文藝首都》1 卷 1 號（1933.01）。

《少年》出版。〈山靈〉與〈叫做權的男子〉被譯成中文，前者收入於胡風編的短篇集《山靈》。⁴⁰可見，張赫宙的文學創作的目的，不在於對內的朝鮮大眾啓蒙的實踐，而是以朝鮮文學代言者之姿，透過日語對外輸出朝鮮文學。在日本敗戰之前，他一直扮演著如此的角色，甚至成為大東亞日語帝國中的朝鮮文學代言者，追隨著帝國版圖擴張，拓展日語讀書市場中「在日」朝鮮文學的讀者。

相對於此，同樣是朝鮮知名作家的金史良卻較關注朝鮮語讀書層的問題。金史良於 1939 年發表的〈朝鮮文學風月錄〉中，嚴肅地探討朝鮮文學的未來，其中關於創作語言的問題，認為朝鮮作家應該重視朝鮮讀者層：

我從一開始便認為張赫宙氏所言，朝鮮文壇度量狹小有所不當。但說真的，朝鮮作家爲了自己的讀書層，還是應該以自己優秀的語言寫作，而且是非寫不可。如果作家捨棄自己的語言，脫離讀者層，那將使具有三千年歷史的朝鮮文化停止。這一點，希望東京的文化人也能認真思考。在朝鮮只會讀朝鮮文字的民眾也有幾百萬人。請想將朝鮮文化葬送於沙漠的想法回收好嗎？⁴¹

金史良進入文壇之際，朝鮮社會面對著更嚴苛的皇民化運動與戰爭動員，朝鮮陷入了民族文化續存的危機，因此，他呼籲朝鮮作家需正視這個問題。在戰爭體制下翻譯活動提供了殖民地作家與殖民當局協商的空間，但實際上朝鮮語和日語內部卻存有本質上不對等的殖民關係，雙語作家參與的雙語互譯活動，只不過提供一個日語「帝國文壇」的「地方文學」，即朝鮮文學存立只不過是假象罷了。⁴²該翻譯活動本身充滿著政治性的動機，隱藏著朝鮮知識分子面對民族文化存亡危機下，展開與殖民者進行文化協商角力的必然性。

創作語言的問題，一直是殖民地作家苦惱的課題之一，面對殖民地當局對漢文（臺灣）與朝鮮語（朝鮮）的禁止政策時，顯得無奈與困頓。在〈《第三代》及其他〉中，楊逵直接批判臺灣當局廢止漢文欄，非明智之舉。轉引胡風之言，直指內地讀者對於中國或臺灣等作家的文學工作，興趣缺缺等。⁴³龍瑛

⁴⁰ 任展慧，〈日本に於ける朝鮮人の文學の歴史〉（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4），頁 204。

⁴¹ 金史良，〈朝鮮文學風月錄〉，《文藝首都》7 卷 6 號（1939.07），頁 99-106。

⁴² 車承棋，〈金史良及其主體問題〉，《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市：清大臺文所，2011），頁 431-447。

⁴³ 楊逵，〈《第三代》及其他〉，《楊逵全集：詩文卷（上）》（同註 31），頁 557-511。原刊於《文藝首都》5 卷 9 號（1937.09）。

宗的隨筆〈熱帶的椅子〉中，也提到「與朝鮮不同的漢文被廢止……。⁴⁴」，顯然他也意識到同是殖民地朝鮮的存在，進一步提醒日人讀者：

中央文壇的新人們在短篇技巧上，已達世界性的水準，巧妙、老練而令人心生敬畏。若是本島作家卻是渴求詞彙、技術、精神的乞食者。作者本身也感到自憐。

如果在此有一篇本島人的作品，取笑那篇作品的幼稚，卻不思及作品背後所背負的廣漠的黑暗文化，將無法充分地理解該作品。（〈熱帶的椅子〉）

龍瑛宗自曝殖民地作家操作日語創作的困境，希望日人讀者除了殖民地作品的文學之外，也能對作品背後「廣漠而黑暗的文化處境」有較深理解。如此的作家期待與讀者的閱讀結果，究竟會產生怎樣的齟齬呢？留待下節討論。

總之，《文藝首都》除了提供日本新人作家發表舞臺之外，因主編保高有心讓它成為殖民地作家對日人讀者發聲的平臺，試圖讓日人讀者有機會理解殖民地作家因民族身分、語言困境等殖民地文學發展上的困境，同時也提供殖民地作家回應日人讀者期待的機會。《文藝首都》雖然只是一份同人性質的文藝雜誌，其發刊量與讀者數顯然難以與文壇主流刊物相匹敵，但是它刊載殖民地作家作品的頻率應該是最高的，持續的時間亦是最久的。接著，將探討殖民地作家與帝國讀者在《文藝首都》上激盪出怎樣的閱讀想像與共鳴？

四、《文藝首都》讀者對殖民地作家的作品的閱讀理解

由於殖民地國語運動的推行，培育出新的日語世代作家，他們所生產的日語作品也陸續進入帝國的讀書市場。殖民地作家透過各種書寫策略，試圖與內地讀者的閱讀慣習相連結，讓日本讀者即使對殖民地文化與現實情境甚為陌生，亦能在其既有的閱讀經驗上，嘗試和作者建構閱讀的共鳴。

三〇年代前期因日本普羅文學運動興盛的關係，知名的普羅作家培植一批新的普羅文學的讀者，文學運動本身因政治的打壓而衰微，但該讀者群仍依舊存在，殖民地作家的農民書寫，似乎與其閱讀經驗相近而較易被接受。因此，如《文學案內》（1936年1月號）的「朝・臺・中國新銳作家集」有中國吳

⁴⁴ 龍瑛宗，〈熱帶の椅子〉，《文藝首都》9卷3期（1941.04），頁63。

組湘的〈天下太平〉（深川賢二譯）、張赫宙的〈アン・ヘエラ〉、臺灣賴和的〈豐作〉（Y 譯），這三篇皆是以貧困的農村現狀作為主要的書寫題材。普羅系讀者如何閱讀理解這些作品，將另行撰文討論。然，殖民地作家藉由異國情境的描寫，喚起日人讀者的閱讀興致，及殖民地異國的浪漫想像。對殖民地文壇而言，文中揭露祖國的陋習（後進性）以對照殖民國的進步性，似乎有「賣友求榮」之嫌，身處夾縫中的殖民地作家對題材的處理，不得不謹慎為之。

在中央文壇獲獎的殖民地作家的作品，無論張赫宙的〈餓鬼道〉還是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殖民地文壇內部皆是惡評連連。對此張極力反擊，龍卻選擇沉默以對。以〈植〉為例，日人讀者對於作品的理解，對於「異國情調」的感知，更勝過對殖民地人民的同情理解，更遑論作者的創作動機的理解問題。⁴⁵ 帝國讀者在有限的閱讀經驗裡，對殖民地的閱讀像是十分有限的。他們只能從己身既有的閱讀經驗出發，各自發展出理解殖民地作品的方式，想像作品的殖民地風景，實難進入作家摹寫的受殖者困頓的心靈世界。

殖民地作家因對殖民社會有其使命感，亦難褪去民族辯護者的角色，一味地以異國情調滿足帝國讀者。因此，他們在提升文學藝術性的同時，又得適時地調整書寫策略與敘事手法，顧及日本讀者市場中讀者的理解能力，讓「他們」讀得懂殖民地現況，進而引發共鳴，期待他們對我族的同情與理解，培養新的閱讀群。

雜誌中的「新刊介紹」是讀者購讀殖民地作品的資訊管道之一，以下試就在《文藝首都》刊出的殖民地作品「新刊介紹」，檢視殖民地作品如何在同人雜誌中被「賣出」抑是被「出賣」？

《叫做權的男子》（筆者註：改造社，1933.6）張赫宙氏著，當選改造的〈餓鬼道〉、〈叫做權的男子〉、〈ガルボウ〉等，是確立張氏作家地位的七篇作品。他為了不喪失朝鮮地方色彩，留在朝鮮執筆創作的努力，在此作品中表露無遺，如全景立體畫般展示了我們所未知，住在朝鮮這塊土地上的人各式各樣的生活樣貌。⁴⁶

又如，《仁王洞時代》（河出書房，1935.06）的「新刊介紹」：

《仁王洞時代》 張赫宙氏的創作集。收錄了〈一日〉、〈劣情者〉、

⁴⁵ 王惠珍，〈殖民地文本的光與影——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例〉，《臺灣文學學報》第 13 號（2008.12），頁 205-244。

⁴⁶ 作者不詳，〈新刊介紹〉，《文藝首都》2 卷 8 號（1934.08），頁 121。

〈十六夜〉、〈山犬〉、〈葬禮之夜發生的事〉、〈愚劣漢〉、〈仁王洞時代〉七篇作品。從處女作〈餓鬼道〉〈奮起者〉等意識形態式的傾向一轉，這本作品集所收錄的作品中，作者潛入朝鮮民族裡，描寫了內地作家中終究難以窺知的朝鮮民族的原貌，它的地方色彩表現得很好。這是這個作家的獨特性，在我國文壇中他之所以被認定其特殊存在之理由。⁴⁷

兩則新刊介紹皆標榜「朝鮮的地方色彩」，提示張赫宙在日本文壇上的特殊身分。雖然在《仁王洞時代》的〈作家之言〉中提到：「我得考慮到，包容和培育如我這樣的創作集的文壇及營業的諸位，和有無支持的讀者的存在。」⁴⁸可見，張的書寫是在意識出版市場與讀者的情況下，所進行的創作。至於意識形態轉變的問題，主要是意指張赫宙脫離普羅文學的影響，對此轉變普羅系的評論者頗有微詞，如德永直批評他創作主題往小資產階級轉移的問題。⁴⁹但，《文藝首都》的逸見廣卻認為〈餓鬼道〉、〈奮起者〉等早期的作品，因作者為達目的而顯得急躁，進而抹煞環境問題的探討，此乃受到普羅文學負面的影響，〈叫做權的男子〉之前的作品皆無法認可。⁵⁰評論者的文學立場因人而異，對殖民地作家作品的評價亦是南轅北轍。如此來自各方的指教，卻讓在東京進行文學修業的張赫宙心理倍感壓力，「每當想到來這裡所寫的小說受到各方負面評價時，便覺汗顏不已。」想家的情緒與生活經濟的壓力，讓他的羈旅生活顯得黯淡而困窘。⁵¹殖民地作家雖有其內在創作之主體，但創作的過程中卻不得不接受來自民族、階級、美學等各方面外在的品評，在加上官方檢閱的枷鎖，作品產出實在甚為不易。

《文藝首都》的同人讀者或是文藝時評者，對於殖民地作家的作品並未特別關注，張赫宙的〈あらそひ〉（紛爭）、〈狂女點描〉在讀書會中並未受到太多的討論。如〈あらそひ〉只見「平凡之作」、「頗富地方色彩的佳作」的評語。⁵²在讀者的〈談話室〉的讀者來信中，提到該作品「讀起來很有趣」，但卻也有讀者認為：

⁴⁷ 作者不詳，〈新刊介紹〉，《文藝首都》3卷9號（1934.09），頁103。

⁴⁸ 張赫宙，〈作家之言〉，《仁王洞時代》（東京：河出書房，1935），頁2。

⁴⁹ 德永直，〈プロレタリア文壇の人々〉，《行動》2卷12號（1934.12），頁188-191。

⁵⁰ 逸見廣，〈張赫宙氏の歩いた途〉，《文藝首都》2卷6號（1934.06），頁91-95。

⁵¹ 張赫宙，〈日記〉，《文藝首都》5卷3號（1937.03），頁131-133。

⁵² 〈支部通信〉，《文藝首都》3卷6號（1935.06），頁201-202。

想說張赫宙氏〈あらそひ〉是朝鮮民族的特別性的題材而進行閱讀，但各地家庭中爭吵之事，甚為平凡。作中允基的兄長描寫有所不足，他的嫂子和母親卻描寫得很好。不如改造入選作〈餓鬼道〉打動讀者般的意義深刻。⁵³

日人讀者對於張赫宙的朝鮮作家身分有其一定的閱讀期待，書寫家庭紛爭的一般性題材，似乎難以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狂女點描〉則是「作者傾訴憤懣，但現實性卻甚為稀薄。」⁵⁴ 同人讀者對作品中呈現的殖民地特殊風土人情，雖有所期待，但想深入理解殖民地的社會現況者應該不多。因此，雜誌主編保高常於「編輯後記」中提點說明被殖民者文學的特點，以期引導同人閱讀，扮演著殖民地作家與日人讀者間重要的橋梁。

保高德藏亦曾對於未能在東京發展的龍瑛宗熱情邀稿，但被殖民者文學的主要寄稿者以在日朝鮮日語作家為主，如：張赫宙、金史良、青木洪（洪鍾羽）、李石薰、金火淳（金達壽）等人的小說為主。以下試就金史良與曾短暫出現於日本文壇的青木洪（洪鍾羽，1908~?）為例，透過史料的鋪陳，檢視帝國讀者閱讀殖民地作家作品的可能性。

相較於張赫宙的出身，金史良的家世與學經歷相當顯赫，不太為現實生活的經濟問題所苦惱，是位自信十足的文學青年。同樣地，他對我族文化的高度越有自信，其感知朝鮮民族被殖民受歧視的能力也越強，使命感越大對殖民者的反彈力道也越重，如此受殖者的心理結構是日本讀者難以讀透的。在《文藝春秋》（1940年3月號）雜誌廣告中，佐藤春夫〈光之中〉的評價：「私小說之中盡情地穿插民族悲慘的命運。」，對此他甚不以為然：

自己並不是只是寫小說的，而是感覺到內心苦楚從有點大的、很大的東西的吵嚷中被掛上彈簧，彈飛而出。至少在那瞬間是那樣地多慮。雖說原是我的作品，但〈光之中〉裡卻有再怎樣都無法痛快的地方。說謊。自己還在說慌。在寫的時候我甚至自己說著。⁵⁵

他在給龍瑛宗的信件中，提到：

兄臺對於〈光之中〉的批評很正確，我也由衷地期待有修訂作品的時候。我並不喜歡這篇作品，那是寫給內地人的，我自己也很清楚。就是

⁵³ 西本一美，〈談話室〉，《文藝首都》3卷7號（1936.07），頁204。

⁵⁴ N·K·生，〈支部通信〉，《文藝首都》4卷4號（1936.04），頁200。

⁵⁵ 金史良，〈母への手紙——芥川賞授與式に參列まで〉。

因為自己太過清楚，才是恐怖。

(中略)

兄臺你在文學上想必有著各種煩惱，所謂傳統的問題吧。這是沒辦法的。自己所背負的、自己血液中所流的傳統精神是莫可奈何的。說來結果那是個重要的問題，意識上是無法拒絕的，應該忠實地有效利用它，建立自己的新文學。我深覺如此。⁵⁶

金史良的〈光之中〉在意識日本讀者的情況下，為了被讀懂而撰寫的作品。其中，他所謂「大的東西」，或許是意指知識菁英所背負的民族文化傳統，面對鋪天蓋地的皇民化運動，他企圖在傳統文化中摸索新的發展方向。

1941年金史良出版個人的第一本創作集《光之中》（東京：小山書店，1941），保高德藏特地為此書撰寫書評。他以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貧窮的人們〉與〈光之中〉相比擬，強調作中人物乃非虛擬人物，而是現實生活中實存人物。

過去朝鮮民族流血的悲劇性歷史之中，如此悲劇性的性格大多包藏在其中。〈光之中〉的作者由衷地愛著這些同胞，更是背負著非愛他們不可的命運。不斷地與他們一起呼吸，與他們的靈魂一同呻吟。因此，一接觸他的作品，我三十年前當時居住於朝鮮的記憶，為之甦醒歷歷在目。作家以自己的眼觀之，以靈魂感之，依自己的表現手法具象化，絕非虛擬之物。⁵⁷

保高基於自己的朝鮮經驗，強調作品的寫實性，在深負使命的作者身上看到民族之愛。最後，他也呼籲讀者「我們內地人應該放棄傲慢之心，傾聽作者的聲音，才得以揣測內鮮融和。」保高點出了內地讀者面對朝鮮作家作品可能的閱讀態度，為呼應戰時內鮮融和之口號，強調此作品集的時代意義。

1942年金史良又出版日語個人創作集《故鄉》，板東三百介紹如下：

我所謂的獨特是指在這本小說集中，有許多取材自半島人的流浪生活，並以非常強烈而極致的表現，不斷地吸引著讀者 - 但並非指手法上的問題。

因為這本小說集是近來因應時局、非良心的眾多小說中，難得一見文學

⁵⁶ 下村作次郎，〈戰後初期の臺灣文學〉，同註 19。

⁵⁷ 保高德藏，〈金史良君の《光の中に》〉，《文藝首都》9卷4號（1941.04），頁 108-109。

魂尚未枯竭的作品集。因其文學的熱情和批判精神猶在。

(中略)

「雖說任何人對故鄉皆充滿依戀而憧憬等。」

作者讓自己的心情平靜寫出跋文，雖言而未盡（從事文學的人應該明白）之事，金史良氏假託故鄉這一題目。故鄉是依他所思，是詩人金氏文學熱情的象徵。⁵⁸

板東在此特別指出作品的獨特性和批判精神，強調該作並非應時之作，故鄉書寫雖然並不特別，但描寫在戰爭體制下的「殖民地故鄉」其言外之意，卻值得細心留意閱讀。

〈光之中〉主要是描寫夜間在 S 協會擔任福利團體英語教師的帝大學生「我」，作為小說敘事者，描述一位日鮮混血的小孩山田春雄的種種行徑。「我」從春雄對「我」異樣的言動中，慢慢地理解到他的母親是朝鮮人的隱情。

春雄的自我認同中充滿著矛盾，他總是認同日本父親背對朝鮮母親，但隱隱中他又對母親有著強烈的渴慕之情。在群體活動中，他總是藉由欺負弱小來掩飾自我的卑怯心理。尤其當他發現南老師是朝鮮人時，竟猶如發現天大秘密般，急欲呼告眾人，但自此兩人卻在民族情感上有進一步的連結。

母親原本是娼妓，卻因父親替她贖身有恩於她，因此在不斷的家暴中忍辱苟活。有一回春雄到醫院探視被嚴重家暴的母親，在返家的途中，「我」與春雄在路上巧遇，當春雄叫他「南」 NANN 老師而非日語發音 MINAMI 時，「我」的心裡竟有總被救贖的感覺。如此的結局似乎充滿著和解的圓滿性。但，其中被贖身的朝鮮母親的國族隱喻為何？春雄外顯的卑怯行徑，正映襯出「我」有意無意想隱匿朝鮮身分的自卑。最後「我」內心的救贖感應是潛在的自我壓抑被釋放而出，顯現在日朝鮮人在日本社會中尋求安頓的渴望。日人讀者究竟如何解讀呢？

根據《文藝首都》讀者會記錄或是座談會的記錄，同人讀者對於描寫殖民地現況的作品，或是在日朝鮮人的作品是較為生疏的。但因〈光之中〉獲選為芥川文學獎的作品，又加上保高的大力推薦，在會中成為被討論的重點，東京讀者會的討論如下：

〈光之中〉（金史良氏）精彩好評。以平穩而有溫情的文章，處理被認為是恒久的民族情感課題不疾不徐，絕對的愛反覆敘述，技法高超，可

⁵⁸ 板東三百，〈新刊批評〉，《文藝首都》10卷7號（1942.07），頁60-61。

以說是首都近來的傑作。只是，結尾部分的落於通俗略感遺憾，可說是千慮一失。⁵⁹

金史良也出席了這一場讀者會。但從簡短的記錄中，可知讀者以形而上「純粹的愛」來理解日鮮民族情感的糾葛。小說中細緻地處理主人公擺盪於「南」（MINAMI）與「南」（NANN）的心理過程，最後回歸代表朝鮮認同的NANN，但其救贖感只不過短暫的心理安慰，並未預告未來的在日生活會如何？看似以喜劇的方式完結，但似乎未能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朝鮮的「創氏改名」和臺灣的「改姓名」是皇民化運動下的文學母題之一，也是理解金史良抗議文學不可忽略的一個側面。⁶⁰

關西的大阪讀者會中，討論如下：

一轉移至〈光之中〉（金史良），有人說是傑作，也有人說尚可，總之是好評。很羨慕他可以將如此暗淡的題材，可以寫得如此光明。有人說想見見作者。只是有人指出如第二十三頁上段那樣，教養低落的人的會話，有點太難了。但還是篇好作品。⁶¹

京都讀者會的討論如下：

〈光之中〉（金史良）相當敏銳的文筆，令人佩服的心理描寫。評為詳細地描寫我們所無法得知的未知數的世界，並一一指出這篇文章中我們所做不到的點，只能佩服。⁶²

神戶讀者會的討論如下：

〈光之中〉（金史良）是圍繞在大學的貧民救濟社中教英語的半島出身的大學生「我」和叫作山田春雄的小孩，及其一家等的關係。以作者特有的觀點，所捕捉之處，誠如保高於編輯後記中所道：「如果不是半島出身的作家是無法感知的優點，在作品中表現得很好。」的作品，一樣以此好感接受這篇文章。但是，在此之中的「我」又與其他人的關係，有其模糊不清之處，並且感覺到「我」對半島出身者的態度，有人指出

⁵⁹ N・K，〈各地讀者會：東京讀者會〉，《文藝首都》7卷11號（1939.11），頁170。

⁶⁰ 南富鎮，〈金史良文學に現れた創氏改名 - 「光冥」と「親方コブセ」を中心に—〉，《昭和文學研究》第38集（1999），頁47-58。

⁶¹ 橫田正之，〈各地讀者會：大阪讀者會〉，同註56，頁171。

⁶² 大澤肇，〈各地讀者會：京都讀者會〉，同上註，頁172。

是安撫他們，並不是放下身段以同等立場視之。另一方面相對於此，有人從書寫立場觀之，如果感受到作者對這些人的愛情，直接表達出來沒有什麼不好，而加以反駁。一時如煙火般對立感高漲。最後的討論，由於「我」的曖昧性，隨之如該作的結局後勁無力。總之，這個月本欄中的像小說的作品，皆是如此。⁶³

以上三地的同人讀者基本肯定這篇作品，但同東京讀者一樣對於結局頗有微詞。但，作者對朝鮮民族的愛顯然是不容質疑，只是對其觀察視角提出疑義。

九洲的讀者雖然離東京最遠，在地理空間上，卻是最接近朝鮮的，相較於上個月東京讀者會因〈半島人〉一作的批評而引起衝突，他們卻認為那篇作品遠不及這個月的〈光之中〉，應關注更有價值的作品，他們的討論如下：

〈雲〉不太意識讀者，不太有讓人產生想去讀的氣力，而〈光之中〉金史良氏的創作全然不同，有著不斷地吸引讀者，不可思議的氣勢。邊讀邊覺得有很多潛藏於讀者胸中，聚集而來的東西。⁶⁴

聚集而來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不得而知，但對於這篇作品展現的閱讀魅力是被肯定的。

出席江東讀者會的讀者雖只有七位，卻一一提出正反互異的個人見解：

這個月的採點，在本欄中金史良氏的〈光之中〉給予八點。描寫的相當不錯，特別是會話的要領等，閱讀該作人物的性格判然若揭。（中島）又從作品全體習得，對人物中每個好人的優點抱有好感。（有馬），給予相當好的評價。但尚且有不成熟的地方。那是為了解決作品中對朝鮮人的肯定與說明吧。（白井）下面的文章中也出現「我」與南區別使用，但一貫使用南想必更有可讀性。（中安）因為將題材寫得太容易了（小寺），對於了解這個時代的人而言，對此將有些許不滿。總之，讚許作者的努力，但努力若是用錯地方就會成為白費功夫。⁶⁵

京濱讀者會則強調作品的特異性，認為〈光之中〉的入選似乎有些意外：

〈光之中〉金史良這篇作品是近年來未見的力作。未能發現如此特異的作品。對於被描寫的東西，並未指出任何一個人的缺點，因而如此的作

⁶³ 潑口新二，〈各地讀者會：神戶讀者會〉，同上註，頁172。

⁶⁴ 村英次郎，〈各地讀者會：九州讀者會〉，同上註，頁174。

⁶⁵ 飛彈八郎，〈各地讀者會：江東讀者會〉，同上註，頁174。

品意外地被選為芥川獎。⁶⁶

城西讀者會的讀者深受作品的感動，同時也似乎敏感地感知到文學獎的風向：

金史良作〈光之中〉是近年來所未見感動讀者的作品。有二三位邊讀邊想說這該不會是芥川獎的候選之作吧，如此有趣的現象令人關注。引以為例甚為失禮，但並非有要動搖該作的審查結果。⁶⁷

出席鴨川讀者會的讀者提出以下的意見：

一轉到〈光之中〉一同恢復了精神意見百出，進退兩難切身之作。抱著當今的時代中無法和解的民族命運。親近小孩的過程有其不足，意見一致。與前半相較後半有其不足，那是因為最後作者與如此深刻的現實相妥協的說法。⁶⁸

鴨川的讀者同樣也對結局最後的妥協，無法認同。對作者而言，結局部分似乎欲言又止，豈非也是他的不滿之處。

根據上述的引文，同人讀者一致認為這是一篇好作品，有其特異性，處理了唯有朝鮮作家方能處理的在日鮮人處境的問題。在文學技巧雖並非成熟之作，但小說的核心議題民族命運的矛盾與作家的妥協，卻被一一被點出，讀者對於作者的同胞之愛深受感動，朝鮮作家的身份也是被關注的重點。金史良刊載於《文藝首都》的作品尚有小說〈土城廊〉、〈箕子林〉，同人褒貶不一，延續〈光之中〉的閱讀期待，關注朝鮮風俗、人物的描寫重點，與會同人讀者發言甚為踴躍。⁶⁹如〈箕子林〉在「東京讀者會」裡的評語如下：

〈箕子林〉（金史良）這位作家的作品已經可以安心地閱讀。文章結構、文句，誠然獨具作者特點之作。〈光之中〉裡包藏的字字句句毫不馬虎，文章的味道甚為出色。但，〈箕子林〉的風格亦難割捨。半島的風物，特別是人物的描繪所至之處頗為鮮明。雖然兩百圓的錢有點問題，但就此批評這篇作品，是沒有任何價值的。⁷⁰

大阪讀者會的記錄卻是：「出現〈箕子林〉單調，有些俗氣之處。但金氏的才

⁶⁶ 末管數夫，〈各地讀者會：京濱讀者會〉，同上註，頁176。

⁶⁷ 玉井廣文，〈各地讀者會：城西讀者會〉，同上註，頁177。

⁶⁸ 沙和夕起子，〈各地讀者會：鴨川讀者會〉，同上註，頁178。

⁶⁹ 受限論文的篇幅，〈土城廊〉等同人意見內容，另文再述。

⁷⁰ S生，〈東京讀者會〉，《文藝首都》第8卷第6號（1940.07），頁187。

華令人欽佩。提出關於朝鮮人各式各樣的問題，太過喧嚷了。」⁷¹「神戶讀者會」中提到：

關於〈箕子林〉、〈家〉其他新人的作品，因為時間的關係不得不割愛。金氏的作品文章粗雜，〈家〉的主題太舊。前者中幾乎反覆著空文般的描寫。作為一種風俗作品，那是致命的。因此，從初試與パワイ再會為止的風俗世界沒有作品的速度感。所謂提高速度並非機械主義，亦非風俗那樣無趣。這是從普通半島作家如〈光之中〉般的作品，移轉至半島風俗介紹時令人感受到的不安。⁷²

京都讀書會的記錄如下：

〈箕子林〉讓人見識到最近奮起精力充沛之處，是金氏不失所望的力作。初次讀到金氏作品的評論者，抗議這篇作品的表現太過濃烈，當讀者是小笨蛋的題材處理方式。讀過〈光之中〉、〈土城廊〉、〈天馬〉的日下部說明金氏在這些作品中的傾向，認為〈箕子林〉與〈土城廊〉的傾向相同，是篇浪漫主義的背後裡隱藏著故事的作品。若承認有其一味的通俗性之立場進行閱讀的話，將一致認為它是篇巧妙而有魅力之作。接著重複著涉及細部的研究性質疑。⁷³

城西讀者會的記錄如下：

金史良氏作的〈箕子林〉文如其人，被他企圖描繪的世界強烈地打動。但前作〈土城廊〉所見的缺點，這篇仍延續可見。首先整體而言，作者自認為可以理解，因而說明不足，讀者讀了卻難以理解掌握。由於事件和人物甚多，人物的個性卻被抹滅，結果人物大多讓人覺得很普通。因此，即使是人物的動作，給人像機械更甚於人類的感覺，未散發出人的臭味和溼度。因此，場所的感覺也還是機械式的，無法感受有機性。只有感受到來自作者的堅強意圖與韌性的壓力。⁷⁴

鴨川讀者會的閱讀記錄如下：

〈箕子林〉（金史良氏）又是篇大受歡迎的作品。震撼靈魂的作品使

⁷¹ YI 生，〈大阪讀者會〉，同上註，頁188。

⁷² K，〈神戶讀者會〉，同上註，頁189。

⁷³ K 報，〈京都讀者會〉，同上註，頁189-190。

⁷⁴ 玉井，〈城西讀者會〉，同上註，頁191。

人入迷，而無話可說。在〈光之中〉、〈土城廊〉和□境中所展現的自信，坦然的風格直令人欽佩，特別是初試與パワイ再會的場面，非常敏銳。⁷⁵

誠如上述，〈箕子林〉是金史良刊載在《文藝首都》上的第三篇小說創作，主要是描寫主角舊知識分子箕初試的生命史，他雖系出名門家學淵源，但舊有的傳統易書占卜知識卻難以維生，加上身體的殘缺使他只能在社會底層苟延殘喘，初試對傳統的矜持讓他的處境更為不堪。金在《光之中》的〈跋〉自道：「（〈土城廊〉）和〈箕子林〉是屬於同系列是對被毀滅的事物的哀愁，至今我仍對這兩篇拙作有著特別的感情。⁷⁶」顯然作者希望透過人物書寫，彰顯朝鮮傳統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受到的困境。人物竟得回歸原始生活狀態，才能保有我族文化的傳承，其反現代化的行徑中，或許隱含著金對於殖民社會的另一種不滿。欠缺朝鮮歷史文化背景知識的讀者，對於作品中殷商箕子開國、沈清傳、書寫「漢字」的文化意義等，似乎難以不言而喻，所以上述的讀者才紛紛提出閱讀上的難處。

在〈光之中〉發表後，金史良積極地在《文藝首都》上發表多篇作品，同人讀者對金史良的寫作題材似乎越見熟悉，接受度亦相當高，肯定金的創作才華與企圖心。唯有對他的藝術技法的提升等，仍有諸多期待。至於金所急欲處理的殖民地朝鮮風土民情的題材，因文化隔閡似乎仍存有閱讀上的困難與齷齪。但從讀者會的記錄中，相較於龍瑛宗等人的讀後感，同人讀者面對金史良的作品的態度是較認真的，除了金史良本身的文學才華受到肯定之外，這或許與金較積極耕耘此一同人園地有關吧。

接著，列舉另一位在日朝鮮作家青木洪（洪鍾羽）的處女作〈在東京的角落〉（〈東京の片隅で〉）的閱讀理解情況，以期說明同人讀者除了得獎作品之外，對於尚未成名的在日朝鮮作家的作品閱讀，有怎樣的回響？

青木洪的生平事蹟甚為不詳，1908 年出生於朝鮮黃海道黃州，父親原是當地有名望的村長，但因故被逐出鄉里。父親於書堂執教鞭維生，但在他十歲時亡故，母親一人扛起照顧祖母和兩位弟弟的責任，他從小就得協助照顧小孩或到商家去當跑腿小弟。他未曾受過正規文學教育，私淑日人作家細田民樹（1892~1972），旅日期間出版他唯一的長篇小說《耕作的人群》（《耕す人々の群》，東京：第一書房，1941.08，首刷二千冊）。該書以私小說的寫作

⁷⁵ 不詳，〈鴨川讀者會〉，同上註，頁 192。

⁷⁶ 轉引自金達壽，〈金史良・人と作品〉，《金史良作品集》（東京：岩波書店，1972）。

方式，道出他對日本自然風物的親近感，及其他對日本人和日本風土的嚮往之情。此作榮獲 1942 年農民文學鑿話會的有馬獎，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被賦予倡導「內鮮一體」的國策書寫的作家角色。⁷⁷

保高在《文藝首都》中為《耕作的人群》撰寫書評，讚許他對朝鮮農民的描寫，雖然寫農民悲慘的生活，卻時而洋溢著光明與愉悅，讓我們感受到朝鮮民族的優點。保高又將他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人物相較，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物是病態的，心理的觸動是多疑的，青木洪的人物是對象性的存在。⁷⁸

〈在東京的角落〉是青木洪以親身經歷作為題材，撰寫而成的私小說。主要是描寫在東京的朝鮮青年申太（本名申太春，渡日後改名為春野申太）與鋼鐵廠工頭的妻子お民的愛戀故事。鐵工廠工頭任性離家出走，工人無薪支領紛紛求去，申太的好友熊公最後也投奔親戚。在家中照顧工人的お民一肩擔起全部的責任，年輕申太因同情憐惜お民，而留在她身邊協助她，進而譜出一段戀曲。最後，申太希望帶著お民回朝鮮尋求屬於他們的幸福。其中，申太對於日本頗有好感，「日本的風俗遠較朝鮮的風俗來得精采。」對於日本的農家生活也充滿嚮往，但情節中卻安排了一段遭其他工人歧視，憤而動手的橋段。日本生活就算有再多的美好，都難敵他對種族歧視的憤懣，歸鄉似乎成為他必然的抉擇。

同人讀者的閱讀反應似乎不如對金史良的作品討論熱烈，但在「各地讀者會」裡同人仍針對這篇作品進行討論，其中的「東京讀者會」反應如下：

相對於末管氏的稱許，〈在東京的角落〉中不管如何都將角落般的情景描寫得很好，倉田氏卻反駁「描寫自以為是，毫無其必然性。」贊成反對各半，意外顯得熱鬧。⁷⁹

大阪讀者會的反應：

青木洪氏的〈在東京的角落〉前半尚可讀，後半則很荒謬。太過粗糙而看不懂，甚為糟糕。不，可以寫出如此荒謬的內容，其心臟之強，應給予讚賞。某氏的嘲笑引起哄堂大笑。⁸⁰

⁷⁷ 任展慧，〈洪鍾羽（青木洪）と《耕す人々の群》〉，《日本における朝鮮人の文學の歴史》，頁 212-224。

⁷⁸ 保高德藏，〈青木洪著『耕す人々の群』〉，《文藝首都》10 卷 3 號(1942.03)，頁 99-100。

⁷⁹ 古川眞佐夫，〈東京讀者會〉，《文藝首都》6 卷 7 號 (1938.07)，頁 196。

⁸⁰ 記錄者不詳，〈大阪讀者會〉，同上註，頁 197。

可見，大阪同人對於這篇作品並未嚴肅看待之，甚至對其幼稚的內容嘲笑之。這樣的嘲笑是可以預期的，所以龍瑛宗才會如前述般，希望內地讀者能夠理解被殖民者所處的社會文化。殖民地作家內心的苦澀與讀者哄笑聲間，有著強烈的反差，一心想在日語文壇尋求文學理想的殖民地作家，似乎被潑了一盆冷水。

京都讀者會的反應：「〈在東京的角落〉文字笨拙但字裡行間仍有可取的強加氣魄，但要使文藝首都本欄生色，尚差一步。⁸¹」而京濱讀者會的反應：

轉至〈在東京的角落〉到目前收起干戈者又出現了。要是說人像流浪者遊蕩的話，也像是被操控的人偶等糟糕的說法。總之，其藝術性的價值淡薄，在會話方面還不及俗文學，甚至比一般常識程度還低劣，是無法否認的。雖然有人說以朝鮮作家來說，這樣的心理是可以讚賞的吧。此說是過於同情的看法。⁸²

在文學表現手法上未受肯定，但是仍有同人對因民族身分引發衝突的情節，採同情的理解。

另外，「談話室」主要是刊載的信件中，京洛的紅人也提及〈在東京的角落〉：

〈在東京的角落〉半島出身的作者穩重的筆致，讓人讀得津津有味，把街頭勞動者的情感描寫得很好。但最重要的是在心理探究中，忘了半島的殖民地任務的什麼事。因此，只有羈旅式的、人情式的印象令人感到不滿。⁸³

這位讀者肯定作者的書寫內容，但顯然更希望作者擔起作為「半島殖民地」作家的任務。

根據上述同人讀者的「閱讀結果」大致可以歸納出幾個現象，即是編輯者保高德藏扮演著殖民地文學導讀者的重要角色。若無《文藝首都》主編保高適時於「編輯後記」、「書評」或讀者會中引導讀者閱讀，殖民地作家的作品實難受到關注。殖民地作家在文學藝術技巧的表現上略有不足，在對話或人物描寫等上也顯得較為幼稚等，這些缺點被時評者與讀者同人一一指出，甚至成為被訕笑的對象。對日人讀者而言，殖民地文學的可讀性，往往在於作品題材的

⁸¹ 鮎川三彌，〈京都讀者會〉，同上註，頁197-198。

⁸² 緒方亮二記，〈京濱讀書者〉，同上註，頁199。

⁸³ 京都紅人，〈談話室〉，同上註，頁201。

特異性，即是殖民地文學所提供的「異國想像」和奇風異俗。期待異國人文風情閱讀的讀者，因作家的身分想像作品，各取所需在作品中獲得閱讀的滿足。對被殖民者較為同情的讀者，側重於被壓迫者的心理描寫。無論〈光之中〉或是〈在東京的角落〉皆出現在日朝鮮人因「朝鮮」的身分產生內外的衝突，如此自我認同上的矛盾焦慮成為在日朝鮮人文學中重要的課題。

無論龍瑛宗的〈宵月〉或上述兩位朝鮮作家的作品，皆處理到被殖民者扭曲的心理狀況。雖然朝鮮作家的作品是書寫在日朝鮮人的處境，但日人讀者對那樣的日朝鮮人的生活空間，仍舊非常陌生。在這些讀者敘述中不難發現，帝國讀者與殖民地作家之間，除了文學敘事是他們共同的交集之外，殖民地社會的困境與被殖民者的所遭受歧視等問題，在他們的閱讀語境中不斷地被稀釋淡化，殖民地作家與帝國讀者之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閱讀鴻溝。

五、結語

從上述殖民地作家們的交流經驗中，我們掌握到他們因參與日本左翼運動與留學生文化運動，而有相互接觸的機會。朝鮮的金史良與臺灣的吳坤煌、張文環可能同時被拘留在東京的本富士警察署而有一面之緣。未有留日經驗者如張赫宙、龍瑛宗等主要是因保高德藏居中牽線，使他們得以在初訪日本之際，能與日本文壇知名作家互動。除此之外，殖民地作家若有因事件而被拘留者，保高亦不惜動用文壇關係，為他們保釋，展現保高對這群旅日殖民地作家最真摯純粹的友誼。

保高積極鼓勵殖民地出身的作家創作，提供《文藝首都》的版面供他們發表，透過個人關係將龍瑛宗、楊達等人的稿件推薦給《文藝》，期待日人讀者對殖民地有較深的理解。但隨著政治情勢的轉變，張赫宙為求文學活動的延續，不得不屈就於檢閱的壓力，轉變其創作風格，這樣的轉變讀者褒貶不一，但朝鮮民族的生活（在日、在滿）皆是他一貫的文學關懷，藉此彰顯殖民地作家在帝國文壇中「被扭曲」的主體性。身為民族作家的金史良卻背負著民族的命運，往返於殖民地文壇與帝國文壇之間，他是在《文藝首都》同人中，被討論最多的殖民地作家。

筆者嘗試從讀者閱讀的角度，找尋新的研究路徑，重新思索殖民地作品在戰前日本文學場域中的存在意義為何？從既存的史料中，檢視欠缺殖民地經驗的同人讀者，對於殖民地作家作品的閱讀理解。可知，他們主要仍聚焦於殖民地作家的身分問題和文學技巧的問題，實難理解作品背後隱匿著，知識分子被

封建舊勢力與殖民地社會壓抑的抑鬱。無論張的〈女性點描〉或是青木〈在東京的角落〉中皆有人物宣洩的憤懣，但同人讀者對於引起憤懣的原因、「種族歧視」等問題避重就輕欠缺對等的理解。殖民地作家想要在帝國的讀書市場上，培養自己的讀者群並非易事，同人雜誌是最易進入的社群團體，金史良透過多篇作品的經營後，獲得同人間的閱讀與肯定。

臺灣作家龍瑛宗與楊逵雖然曾積極地希望與《文藝首都》建立互動關係，但是因為身處殖民地多所不便，和各種客觀因素的侷限，最後只能不了了之。他們與日人讀者的互動關係有如吉光片羽，難以長期經營，帶給日人讀者的閱讀衝擊顯然甚為有限。

臺灣與韓國戰前雖同是日本殖民地，受殖經驗中又其類似的歷史經驗，但彼此的讀者相互似乎不甚熟悉。在臺灣殖民地空間書寫中，除了妓院朝鮮樓的建物和身穿韓國衣裳的神女之外，較少具體朝鮮人形象貌的描寫。⁸⁴ 在戰前日語帝國文化圈中，韓臺讀者之間透過日語究竟會激盪出怎樣的閱讀想像，則有待進一步探究。

(責任校對：林佩苓)

⁸⁴ 如龍瑛宗的〈斷雲〉，《龍瑛宗全集：小說集（3）》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6.11），頁164。

附錄（一）殖民地作家刊載於《文藝首都》之作品目錄初編

王惠珍製作

年份	作 者	題 名	文體	出版刊物 / 卷號
1933	張赫宿	〈僕の文學〉	隨筆	《文藝首都》1-1
	張赫宿	〈特殊の立場〉	隨筆	《文藝首都》1-2
	張赫宿	〈兄の脚を截る男〉	小說	《文藝首都》1-5
	張赫宿	〈優秀より巨大へ〉	評論	《文藝首都》1-9
	張赫宿	〈奮ひ起つ者〉	小說	《文藝首都》1-9
	張赫宿	〈「文藝時評」翻譯の問題・その他〉	評論	《文藝首都》1-10
	張赫宿	〈秋日抄〉	隨筆	《文藝首都》1-12
1934	張赫宿	〈女房〉	小說	《文藝首都》2-1
	張赫宿	〈山犬〉（ヌクテ）	小說	《文藝首都》2-5
	張赫宿	〈素朴と非素朴〉	評論	《文藝首都》2-10
	H・N・K (許南麒) ⁸⁵	〈朝〉（賞）	詩	《文藝首都》2-11
1935	H・N・K	「逝く春の煙上れり山の小屋」	俳句	《文藝首都》3-3
	張赫宿	〈あらひそ〉	小說	《文藝首都》3-5
	崔東一	〈希望〉	詩	《文藝首都》3-5
	張赫宿	〈ある感覺〉	隨筆	《文藝首都》3-8
1936	張赫宿	〈狂女點描〉	小說	《文藝首都》4-3
	張赫宿	〈明治大正の文學運動座談會〉	座談	《文藝首都》4-11
	張赫宿	〈或る時期の女性〉	小說	《文藝首都》4-11
1937	張赫宿	〈北条民雄氏のこと〉	隨筆	《文藝首都》4-12
	張赫宿	〈大正時代の文學運動座談會〉	座談	《文藝首都》5-1
	張赫宿	〈本郷付近の散歩 / 我が散策〉	隨筆	《文藝首都》5-1
	張赫宿	〈お正月〉	隨筆	《文藝首都》5-2
	張赫宿	〈日記〉	隨筆	《文藝首都》5-3
	張赫宿	〈私の一番言ひ度いこと〉	問卷	《文藝首都》5-3
	龍瑛宗	〈東京の鴉〉	隨筆	《文藝首都》5-8

⁸⁵ 南富鎮，〈なぜ日本語で書くのか金聖珉の日本語小説を視座にして〉，《「翻譯」の圈域：文化・殖民地・アイデンティティ》（筑波大學文學批判研究所編，2004.02），頁 289。

	孫東村	〈草堂〉	小說	《文藝首都》5-9
	楊 達	〈第三者・その他〉	評論	《文藝首都》5-9
	張赫宿	〈滿洲移民について〉	隨筆	《文藝首都》5-10
1938	張赫宿	〈春香伝〉について	散文	《文藝首都》6-3
	青木洪 (洪鍾羽)	〈東京の片隅で〉	小說	《文藝首都》6-6
1939	龍瑛宗	〈わが秋風帖〉	隨筆	《文藝首都》7-1
	張赫宿	〈ブツク・レヴュウ〉	評論	《文藝首都》7-2
	金史良	〈朝鮮文學風月錄〉	評論	《文藝首都》7-6
	金史良	〈エナメル靴の捕虜〉	隨筆	《文藝首都》7-9
	金史良	〈光の中に〉	小說	《文藝首都》7-10
	李石薰	〈交通事故〉	隨筆	《文藝首都》7-11
1940	金史良	〈土城廊〉	小說	《文藝首都》8-2
	金史良	〈母への手紙〉	書簡	《文藝首都》8-3
	金史良	〈箕子林〉	小說	《文藝首都》8-5
	龍瑛宗	〈宵月〉	小說	《文藝首都》8-6
	金史良	〈玄海灘密航〉	隨筆	《文藝首都》8-7
	龍瑛宗	〈二つの《狂人日記》〉	評論	《文藝首都》8-10
	金史良	〈平壤より〉	書簡	《文藝首都》 8-11.12 合併號
1941	龍瑛宗	〈同人日記〉	隨筆	《文藝首都》9-1
	金史良	〈火田地帶を行く I : メンドレミの花〉 (三回)	隨筆	《文藝首都》9-2
	龍瑛宗	〈熱帶の椅子〉	隨筆	《文藝首都》9-3
		〈火田地帶を行く II : 部落民の薪の城〉	隨筆	《文藝首都》9-4
		〈火田地帶を行く III : 村の酌婦〉	隨筆	《文藝首都》9-5
	金史良	〈山の神々〉	隨筆	《文藝首都》9-6
1942	張赫宿	〈その頃の思い出す〉	隨筆	《文藝首都》10-2
	金火淳 (金達壽)	〈塵〉	小說	《文藝首都》10-2
	金火淳	〈無駄に就いて〉	評論	《文藝首都》10-9

引用書目

一、文獻

- 《臺灣公論》12月號（1943.12）。
- 《文藝首都》1~10卷（1933~1942）。
- 《行動》2卷12號（1934.12）。3卷2號（1935.02）。

二、專書

- 車承棋，〈金史良及其主體問題〉，《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市：清大臺文所，2011）。
- 柳書琴，〈荊棘之道 -- 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臺北市：聯經，2009）。
- 鄭百秀，《コロニアリズムの超克——韓國近代文化における脱植民地化への道程》（浦安市：草風館，2007）。
- 安宇植，《「在日」文學全集》（東京：勉誠出版，2006）。
- 河原功，《講座 臺灣文學》（東京：國書刊行會，2003）。
-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市：允晨文化出版，2001）。
- 彭小妍編，《楊達全集 資料卷》（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
- 白川豐，《殖民地期朝鮮の作家と日本》（岡山市：大學教育出版，1995）。
- 下村作次郎，〈戰後初期の臺灣文學〉，《文學で讀む臺灣：支配者・言語・作家たち》（東京：田畠書店，1994）。
- 任展慧，《日本に於ける朝鮮人の文學の歴史》（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4）。
- 保高德藏，《金史良作品集》（東京：理論社，1972）。
- 保高みさ子，《花實の森一小說文芸首都》（東京：立風書房，1961）。

三、論文

- 王惠珍，〈戰時東亞殖民地作家的變奏：朝鮮作家張赫宙與臺灣作家的交流及其比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3期（2011.10）。

王惠珍，〈殖民地文本的光與影——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爲例〉，《臺灣文學學報》第 13 號（2008.12）。

下村作次郎，〈臺灣人詩人吳坤煌の東京時代（1929 年 -1938 年）——朝鮮人演劇活動家金斗鎔や日本人劇作家秋田雨雀との交流をめぐつて〉，《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 27 號（2006.03）。

下村作次郎，〈現代舞蹈和臺灣現代文學 -- 透過吳坤煌與崔承喜的交流〉，《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臺北市：文建會，2007）。

下村作次郎，〈臺灣人詩人吳坤煌の東京時代（1929 年 -1938 年）——朝鮮人演劇活動家金斗鎔や日本人劇作家秋田雨雀との交流をめぐつて〉，《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 27 號（2006.03）。

王惠珍，〈龍瑛宗と《文芸首都》同人との交流〉，《天理臺灣學會會報》第 12 號（2003.06）。

南富鎮，〈金史良文學に現れた創氏改名—「光冥」と「親方コヅセ」を中心 に一〉，《昭和文學研究》第 38 集（1999）。

任展慧，〈日本における朝鮮人文學の歴史〉，《國際高麗學會日本支部通 信》第 3 號（1994.12）。

Empire Readers' Reading and Imagin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lonized: The Peer Magazine *Capita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as an Example

Wang, Hui-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Japanese peer magazine *Capita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examining how empire readers read and imagine the texts of the colonial writers. First, this paper delineates the career of the magazine's chief editor 保高德藏 and clarifies his character as well as explicates his relationships with those colonial writers who travelled in Japan and his support for their creative activities. Second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lonial writer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Final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ways by which the readers of the magazine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lonized. Through the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such as 金史良's "In the Light" and 青木洪's "At the Corner of Toky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those readers who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Japan's colonies have their own blindness and insight while encountering these texts by colonial writers. More often than not, they dwell upon the literary level of the texts, but neglect the colonial writers' anger and anxiety with regard to their contradictory identity. In sum, in the field of the Japanese literary circle,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colonial writers to meet someone who really understand their hidden messages and therefore the value of their work changes over time and is often endowe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Keywords: Empire Readers,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lonized,
Capita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